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四辑(2016年第4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国际文献综述

王振宇 顾昕

分工细化、共同代理与串谋

——基于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

张帅

制度的分配性与制度变迁的权力逻辑

王广亮 常芳

代际传递：父母政治资本是否有利于子女创业

陈怡安

农户分化下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南省594户农户的调查

刘辉 黄少安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四辑 (2016 年第 4 期)

黄少安 主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6 年. 第 4 期: 总第五十四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41 - 7604 - 9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 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5558 号

责任编辑: 于海汛 何 宁
责任校对: 杨晓莹
责任印制: 潘泽新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四辑 (2016 年第 4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5. 75 印张 300000 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604 - 9 定价: 45.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制度经济学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国际文献综述 王振宇 顾 昕 (1)

分工细化、共同代理与串谋

——基于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 张 帅 (17)

制度的分配性与制度变迁的权力逻辑 王广亮 常 芳 (30)

代际传递：父母政治资本是否有利于子女创业 陈怡安 (44)

制度视阈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张为杰 李守明 王 询 (63)

农户分化下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南省 594 户农户的调查 刘 辉 黄少安 (86)

基于现代租金理论的失地价格与模拟分析：

一个市场逻辑 宋文飞 李国平 韩先锋 杨永莲 (103)

中国再担保制度对协作担保机构信用风险的监测研究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顾海峰 程 磊 (131)

关系类型和信息类型对社交网络用户转发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力距离和大五人格的调节作用 石文华 陈 楠 张 绮 (162)

员工感知视角下的培训与员工绩效关系研究
——以组织公民行为为中介变量 王成利 (181)

人格财产及其保护的经济学解读 李 宁 (199)

“第十四届 (2016 年度) 中国法经济学论坛”
会议综述 於勇成 褚红丽 司海平 (216)

“2016 年 (第十六届) 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会议综述 董 骥 (224)

后记 (242)

CONTENTS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Literature Review **WANG Zhenyu GU Xin** (16)

Division of Labor, Common Agency and Conspiracy

——The Analysis of Non-cooperative Game

Equilibrium **ZHANG Shuai** (29)

The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Power Logic **WANG Guangliang CHANG Fang** (43)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Whether Political Capital of Parents Is in

Favor of Children' Entrepreneurship **CHEN Yian** (62)

Study on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Dubin Model **ZHANG Weijie LI Shouming WANG Xun** (85)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Farmers' Plant more

under the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594 Peasant Households

in Hunan Province **LIU Hui HUANG Shaoan** (102)

Theory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Land Lost Price Based on Modern

Rent Theory: A Market Logic

..... **SONG Wenfei LI Guoping HAN Xianfeng YANG Yonglian** (130)

Study on Credit Risk Monitoring of China Reguarantee Institution to

Cooperation Guarantor

——Mode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GU Haifeng CHENG Lei** (161)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Type and Information Type on Social
Network Use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wer Distance and Big Five
Personality **SHI Wenhua CHEN Nan ZHANG Qi** (18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Based on
Perception of Employees
——The Study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WANG Chengli** (198)

Personhood Property and Its Protection: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LI Ning** (215)

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 国际文献综述*

► 王振宇 顾 昕** ◀

【摘 要】 文章系统地回顾了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国际文献，并发现，虽然大多数研究支持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研究对象、研究层次、指标度量的不同，结论会出现分歧。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族群冲突导致的国家失败和腐败等被认为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影响机制，同时，制度和规模也是影响族群多样性起作用的约束因素。文章最后指出了目前研究成果面临的挑战：一、指标变化对结论的影响；二、内生性问题；三、影响机制研究的不够深入；四、族群多样性概念本身仍需细化，并给未来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 族群多样性 经济增长 族群冲突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学中，对多样性（diversity）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任何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人群在诸多人口统计指标（demographic indicators）上都会呈现某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倘若某些指标的异质性大到一定程度，那么该人群之中便会出现一些可辨识的亚群体，从而产生多样性。作为分析单位，这里所谓的“特定范围”既可以是地理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既可以大到国家，也可以中到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如城市）或不同的经济部类（如产业）或不同的社会界别（如教师或管理

* 本文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振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100871）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廖凯原楼，E-mail: wzhenyu@pku.edu.cn；顾昕（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E-mail: guxin@pku.edu.cn。

者),小到社区、村庄、宗族、家庭、组织以及组织内的更小单位(如大企业的分公司、教育机构中的班组或院系、协会中的集体会员等)。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而“经济人的人群”并不具有多样性。经济人具有某种同质性(homogeneity),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工作还是无工作、白种人还是有色种人、信上帝真主还是拜神求佛。当然,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现实世界中的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但新古典经济学者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考虑个体所属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对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但近些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以群体为基础的偏好异质性(the heterogeneity of preferences)对微观经济活动(如储蓄和投资)及其宏观结果(如经济增长)的影响(Leff and Sato, 1993),并取得了相当广泛而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以各种方式开始处理经济主体的多样性问题,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地域、国籍、语言、信仰和风俗之别等。在这里,我们仅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及其合作者提出的“认同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又译“身份经济学”),认定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自我感觉和认知(即“认同”)会对其效用函数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人际互动(Akerlof and Kranton, 2010)。认同经济学致力于把各种认同因素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对诸如工作场所的歧视、教育不平等、贫困、社会排斥、劳动分工、失业等社会经济现象加以解释(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2002; 2005)。

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是经济主体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在当今世界,不仅单一族群国家或许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族群多样性还呈现在地区、社区(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的因素,引致偏好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实,早在1983年,著名社会理论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就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了族群同质性有利于经济成功的经典性命题(Gellner 1983, cha. 3, 6),但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并非得到实证研究的确认。很长一段时期,族群同质性或异质性的经济影响一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直到威廉·伊斯特利和罗斯·莱文(Easterly and Levine, 1997)提出,亚撒哈拉非洲诸国在诸多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可由这些国家的族群多样性来解释,并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这是经济学家从相反的方向对“盖尔纳命题”的首次直接证明。但值得细加考量的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仅有负效应?艾尔波托·艾莱斯纳和埃利安娜·费拉拉(Alesina and Ferrara, 2005)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纽约和洛杉矶是美国族

群多样性较大且种族关系麻烦最多的两个城市，但也是最具文化创意和经济活力的城市。因此，多族群社会中多样性之利与异质性之弊究竟对该社会的经济表现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一、族群多样性经济增长降低效应的确认：区域与全球

一般认为，关于族群多样性负经济增长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始于威廉·伊斯特利和罗斯·莱文（Easterly and Levine, 1997）。他们在这篇经典论文里分析非洲诸国经济表现，尤其是解释了亚撒哈拉非洲经济增长低水平，即所谓“非洲增长悲剧”，其重要发现之一是族群多样性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负相关。这篇论文引发了有关“非洲增长悲剧”的跨学科研究浪潮，其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发现得到了很多后续研究的确认（Platteau, 2009）。

很快，就族群多样性是否对经济发展有降低效应，学界的研究对象从非洲拓展至其他地区乃至全球。艾尔波托·艾莱斯纳、礼萨·巴吉尔和威廉·伊斯特利（Alesina, Baqir and Easterly, 1999）确认族群异质性对于美国城市的经济表现有降低效应。塔德·奥克的奇（Tade Okediji, 2004）发现，种族/肤色及其教育差异对巴西各地区民众的收入增长潜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内地区间的差异，而且表现在更广范围内的跨国差异。奥乌兹汗·丁切尔和王帆（Dincer and Wang, 2011）使用中国第三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族群分化指标和族群极化指标，以省级行政地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族群分化和族群极化对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族群分化指标和族群极化指标都显著降低了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增长率。

这项研究还在跨国比较的视界中展开。在一项有关政府质量的跨国性（152个国家）比较研究中，拉斐尔·波尔塔等人（La Porta et al., 1999）提及族群语言异质性与政府治理质量负相关，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艾尔波托·艾莱斯纳等人（Alesina et al., 2003）基于全世界190个国家的数据，综合考察了族群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威廉·伊斯特利和罗斯·莱文基于非洲得出的结论拓展至全球，并进一步发现，语言分化度（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与经济增长呈现强的负相关关系，而宗教分化度（Religious Fractionalization）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

当然，族群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因素。艾尔波托·艾莱斯纳和埃利安娜·费拉拉（Alesina and Ferrara, 2005）构建了一

个族群多样性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其推演显示族群多样性在对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会因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某些私人物品产量的提升。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作用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呈现，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查德·施帕贝尔（Sparber, 2009）分析了美国1980~2000年间各产业的人口普查资料数据，发现那些依赖于决策创意和消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业（如广告、旅游餐饮休闲、法律服务等）受益于种族多样性，而需要高水平团队努力的行业（多种制造业、交通业、飞机维修行业等）会因种族多样性而受损。可以说，查德·施帕贝尔为艾尔波托·艾莱斯纳和埃利安娜·费拉拉建构的模型提供了部分实证基础。

此外，不同类型的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对经济表现造成不同的影响。乔斯·蒙塔尔沃和玛尔塔·雷纳尔-克罗尔（Montalvo and Reynal-Querol, 2005）用跨国数据分别检验了衡量族群多样性的两个指标——“分化指标”（Fractionalization Index）和“极化指标”（Polarization Index）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分化指标是指从一个地区随机挑选两个人，他们分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假设族群大小相同，则族群种类越多，分化指标越高。极化指标衡量的是不同族群极化或者说势均力敌的程度，当该地区由人数彼此接近的很少几个族群主导时，族群个数越少，极化指标最高。只有单一族群或族群个数很多时，极化指标都较低。在大多数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文献中，多采用族群分化度指标。乔斯·蒙塔尔沃和玛尔塔·雷纳尔-克罗尔发现族群分化和族群极化都对经济发展有显著负效应，但不支持之前文献主张的族群分化以增加社会冲突抑制经济发展的机制。同时，他们发现族群极化显著提高了社会冲突（甚至内战）发生的概率并降低了投资。

与此相类似，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还有可能随族群多样性的程度变化而呈现非线性特征。罗伊·切尔奎蒂等人（Cerqueti et al., 2012）的动态理论模型显示族群分化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非线性，即高增长出现在族群分化中等的地方，而低增长则出现在族群高度同质或高度异质的地方。但这篇文献有关族群高度同质性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来自模型推演，既与现实世界中诸多明显的实例（如欧洲早期工业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相背离，也与绝大多数相关文献的看法相左。实际上，这些文献关注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这一课题，要么预先假定、要么早已确认族群同质性有利于经济发展。

二、族群多样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机制：微观与宏观

如果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确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通过何种机

制发生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察。族群多样性首先会对个体的微观经济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宏观的经济产出产生影响。

（一）微观机制

就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我们至少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认同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找到可能的分析路径。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增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尤其体现对契约谈判、订立和执行成本的影响之中；族群多样性可能会增大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损于最优经济活动的开展；族群多样性可使人们的经济决策受制于认同考量，即“成为何种类型的人”（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748），从而丧失更多的达成交易的机会；族群多样性中内生的偏好异质性尤其会体现在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之上，从而有损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更为一般的公共部门的表现。

总体来说，在既有文献中，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微观机制的探讨，比较稀缺，但也比较聚焦。稀缺性的体现，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认同经济学的视角较少出现在族群多样性的文献之中。这一稀缺性可谓族群多样性文献中迄今为止最为显著的不足。聚焦性的体现，在有关微观机制主要是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即认为高水平的族群多样性会引发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尤其体现为诸多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些公共物品既包括实体性基础设施也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教育）。艾尔波托·艾莱斯纳、礼萨·巴吉尔和威廉·伊斯特利（Alesina, Baqir and Easterly, 1999）建立了一个偏好极化与公共物品提供模型，并据此使用美国城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族群分化（ethnic fragmentation）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生产性公共物品（如教育、道路、排水和垃圾处理）提供的公共财政支出越少。

族群多样性对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有负面影响，这并非一个全新的见解，但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对此问题的传统智慧主要缘于对公共教育的研究。事实上，有关族群多样性对公共教育的影响，早已成为美国公共管理和教育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有意思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戴维·皮茨（Pitts, 2005）以美国德克萨斯州学区为分析单位，研究了种族和族群多样性对公立中学教育的影响，发现教师多样性对辍学率和考试成绩有影响，而管理者多样性则没有影响；但有意思的是，此文还以学生为基数建构了教师和管理者族群代表性的指标，发现教师族群代表性与辍学率无关但与学生 SAT 考试表现有关，而管理者族群代表性则与辍学率和考试表现呈现全面而显著的

负相关。当然,族群多样性对公共教育的不利影响并不限于美国。爱德华·米格尔和玛丽·古格蒂(Miguel and Gugerty, 2005)发现,在肯尼亚,族群多样性既不利于小学的硬件建设(如降低小学的筹资水平并使学校的设备更加糟糕),也有损于小学的软件运行(如多族群地区的学校委员会对违规家长的惩罚力度大为不足)。

至于族群分化地区为什么在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表现糟糕,艾尔波托·艾莱斯纳和埃利安娜·费拉拉(Alesina and Ferrara, 2005)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其中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显示出异质性偏好,进而影响到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模型推演表明,较高异质性的社会可以在私人物品上展现较高的生产率,但会使税收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水平相对降低,其根源在于具有族群异质性的社会共享公共资源的意愿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篇发表在顶级政治学学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论文,以不同的方法,对“艾莱斯纳-费拉拉模型”进行了拓展,值得加以重视。詹姆斯·哈比亚利马纳等人(Habyarimana et al., 2007)辨识出将族群多样性与公共物品提供不足联系起来的三组机制,即偏好机制、技术机制和战略挑选机制,并通过一系列博弈实验对此进行了检验。此文发现,族群同质性较高的社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成功可以归因于战略挑选机制,尤其是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社会,相关族群之间可以产生合作性博弈均衡。此外,技术机制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即技术进步有助于推进社会网络的形成,并在其中实现社会惩戒的有效行使。但偏好机制,即偏好或口味的共同性,或较高度度的利他主义,对于集体合作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凯特·鲍德温和约翰·休伯(Baldwin and Huber, 2010)探讨了族群多样性的形式对于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此文将族群多样性归为两类,即文化差异性和经济差异性,并基于46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族群间收入差异性才是造成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显著解释变量,而包括族群语言异质性在内的诸多文化差异性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构成显著的影响。这两个研究提示我们,即便我们将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机制聚焦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族群多样性影响公共物品提供的机制依然有很多细节尚待厘清。

(二) 宏观机制

与微观机制探索的相对稀缺和相对聚焦相比,既有文献关于宏观机制的讨论是丰富多彩的。最为显著的是,族群多样性程度较高会提高族群冲突的概率,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府施政,导致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从而对长期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Easterly and Levine, 1997)。除了族群冲突层

出不穷、公共秩序荡然无存、政府更迭频密杂乱之外，国家失败还有更多的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体现。在一篇有关“非洲增长悲剧”的跨学科文献综述中，琼-菲利普·普拉托（Platteau, 2009）确认，地区性的强族群认同妨碍了现代公民的出现，非正式社会规范的强大作用削弱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可信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个人资本积累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降低了原住民企业和聚居区的经济表现。总体来说，族群分化/分割/分裂既是持久不息的国家失败的内生性原因，也是其内生性结果，而在国家失败的地方，经济表现自然没有可能获得持续的改善。

国家失败的最惯常表现就是社会冲突的频率。丹尼·罗德里克（Rodrick, 1999）对1975~1989年110~118个国家出现增长崩溃的根源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是其内部社会冲突与外部冲击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其内部冲突管理的制度。其中，以经济不平等和族群分化度来度量的社会分离情形严重的国家，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增长率下滑。

国家失败的最严重表现就是引发内战，而内战对经济表现的灾难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族群多样性是否与内战爆发的概率有所关联，就非常相干了。易卜拉欣·艾尔巴瓦蒂和尼古拉斯·萨姆巴尼斯（Elbawadi and Sambanis, 2002）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内战爆发决定因素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和社会模拟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族群分化和内战频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内战自然会极大地有损经济发展。但该文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如果当地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即便族群分化水平较高，内战发生的概率也会降低。

本杰明·布里奇曼（Bridgeman, 2008）建立了一个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分析究竟是政府再分配还是冲突/内战构成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的机制，并通过模拟发现，收入降低的最主要根源在于族群多样性引发的再分配而不是族群冲突。但这个模型仅设定了两个族群，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多族群社会，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分析依然支持了易卜拉欣·艾尔巴瓦蒂和尼古拉斯·萨姆巴尼斯（Elbawadi and Sambanis, 2002）的一个发现，即在多族群国家，如果政府没有致力于推进普惠众族的经济增长而是致力于在族群间进行再分配，反而会阻滞收入水平的上升。

托马斯·坦格拉斯和尼尔斯-彼得·拉格勒夫（Tangerås and Lagerlöf, 2009）也建构了一个博弈论模型，分析再分配与族群冲突和内战的关系，发现自我强化型再分配和权利分享型政治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而这种情况在同质性或异质性很高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而在族群多样性中等水平的地方，内战的风险反而较高。这篇文献模型推演的一些结论与常识不大相符，或许这与此文忽视了族群分化与族群极化的差别有关。

可是，族群多样性与族群冲突（以及内战）概率的关系，一直就是一

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 (Paul Collier, 2011) 认为, 对于族群多样性与差经济表现和高冲突风险的关联性, 需要加以仔细考察, 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 族群分化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在民主国家一般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族群分化固然会降低公共部门的表现, 而活跃的民间部门会抵消掉这种不良影响, 但在独裁国家, 族群分化就会具有破坏性。可是, 无论民主与否, 主导性族群的存在都有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这一效应本身并不强烈。至于内战爆发的风险, 也同族群极化而不是族群分化有关。总体来说, 只要不出现族群极化, 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社会既能实现社会稳定, 也能呈现经济活力。

保罗·科利尔的这些结论后来得到了小寺等人 (Kotera, et al., 2015) 的部分支持, 尽管此文考察的是族群多样性对社会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影响。此文基于 157 个国家的数据, 以国民健康结果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 通过计量分析发现, 掌政族群的规模对于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 在独裁或拥有主导性族群的民主国家中, 族群多样性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呈现负相关, 而在没有主导性族群的民主国家两者之间没有单调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族群冲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其实也是公共管理学者早就关注的课题。该领域顶级学刊《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Esman, 1997) 指出, 公共行政如何在处理族群冲突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扮演有效的中介性角色, 这个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研究领域同时受到了忽视, 并呼吁相关学者对此课题给予高度重视。

关于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宏观机制, 除了国家失败及其在族群冲突甚至内战上的具体表现之外, 另一个考察热点在于腐败。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 族群分化度高的地方, 政府腐败愈甚, 而政府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会拉低经济增长。在安德鲁·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 (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的模型中, 所谓“独立受贿者” (Independent Bribe-takers) 越多, 腐败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更甚。他们的文章提及, 在高度异质性且治理不佳的国家, 独立受贿者数量较多, 而在那些有警察国家之声、寡头统治或同质性高国家, 腐败固然有, 但破坏力量弱于异质性高的国家。保罗·莫罗 (Mauro, 1995) 试图证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使用了族群语言多样性指数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 以克服内生性偏差, 却意外地发现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拉斐尔·波尔塔等人 (La Porta, et al., 1999) 在有关政府质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 提及了族群分化与腐败的关联性。威廉·伊斯特利和罗斯·莱文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中的数据分析显示, 在非洲国家, 1990 年的腐败程度与其 1960 年的族群分化度显著正相关, 而对抑制腐败有重要影响的法治水平则呈现显著负相关。在一篇有关外国援助与寻租的论文中, 雅各布·斯文松 (Svensson, 2000) 发现, 外国援

助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即英文中所谓 windfall gains）容易诱发寻租激励，而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地方，寻租激励越强。在罗伊·切尔奎蒂等人（Cerqueti et al., 2012）的模型中，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是由腐败作为中介的，族群分化性与基于族群的腐败呈现非线性关联，即族群高度同质性和高度异质性都容易导致高腐败，而低腐败出现在族群分化程度中等的地方，而腐败又影响了经济增长。

三、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约束条件：制度和规模

任何影响都是有条件的。对于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约束条件，已有文献论及了政治制度以及人口/政府规模。

总体来说，族群多样性（尤其是族群极化性）的不利经济影响得到了很多研究的确认，但这种不利影响的发生概率或许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会有所不同。前文提及的保罗·科利尔（Collier, 2001）论及了民主与独裁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保罗·科利尔（Collier, 2000）的发现。保罗·科利尔在民主和独裁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在促进增长与实施再分配之间权衡的模型，并以 94 个国家跨时期数据加以检验，发现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破坏性效应只发生在政治权利保障有限的国家，而在民主国家之中这种效应不会呈现。同时，此文还以世界银行在 89 个国家实施的项目为研究对象，发现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所在国家是否民主有关。

然而，对于民主制度会不会抵消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约翰·布鲁多恩（Bluedorn, 2001）注意到了这其中蕴含的内生性问题。民主制度的存在（或良好运行）多发生在族群分裂不严重的地方，因此族群分化与民主运行是互为因果的，即民主制度消弭了族群分化所带来的问题，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民主制度，或者说，弱族群分化让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作，而这又反过来消弭了诸多族群相关性问题的。此外，他发现，即便在相对来说具有族群同质性的国家，民主制度运行本身也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把民主制度作为控制变量时，得出的结论需小心处理。

除了政治制度之外，政府规模也会产生影响。艾尔波托·艾莱斯纳及其合作者专门研究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国家规模（即分裂还是统一）的决定因素，认为管辖地区大带来的好处与人口异质性高引致的成本之间出现的权衡，是导致某些国家出现分裂的根本原因。由此，民主化为分离主义者寻求退出创造了政治条件，而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化或全球化也会使国家规模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小国家既能间接地享受大国家的好处，又无需为